

国外社会学者论中国社会的现代化

严立贤

帕森斯在《现代社会体系》一书中对世界现代化三个阶段做了划分,据此,我们可以把西方社会变迁理论中的“现代化理论”也大致分为这么三个阶段。自十七世纪到十九世纪末为现代化理论的第一阶段,它包括洛克的古典市民社会论,斯密和李嘉图的古典经济学和圣西门、孔德、斯宾塞等人的实证主义产业社会论。这一阶段的现代化理论是对应于帕森斯所说的以英国和法国为代表的西欧社会的现代化的。由于当时的现代化还只局限于西欧社会,现代化论者所关心的只是欧洲社会的现代化,无暇顾及东方社会。二十世纪前半叶为现代化理论的第二阶段,它是与帕森斯所说的以德国和北欧为主导的第二阶段的现代化相对应的,包括迪尔凯姆的从机械连带到有机连带的理论,滕尼斯的从礼俗社会到法理社会的理论以及韦伯的从传统社会到近代社会的理论,等等。这一阶段的现代化理论的特点是随着现代化由西欧到中欧和北欧的扩展,现代化论者的视野也有所扩大,在论述欧洲社会的现代化的同时,也对东方社会特别是中国、印度的社会发展产生了兴趣,常常在论述欧洲社会的现代化问题的时候论及东方社会,通过二者的比较揭示欧洲社会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些特质。西方社会学者对中国现代化问题的论述是从第二阶段的现代化理论开始的。到了本世纪六十年代,现代化理论进入了第三阶段,这一阶段的现代化理论是与帕森斯所说的以美国为主导的第三阶段的现代化相对应的现代化理论,其特征是现代化理论的中心由欧洲移到了美国,对第三世界不发达国家的现代化的理论探讨,也成了现代化理论的中心议题之一,中国作为一个不发达的大国,其现代化问题理所当然地引起了西方社会学者的广泛兴趣。下面仅就几个有代表性的国外社会学者对中国社会现代化问题的论述做一简要评介。

—

现代化理论从第二阶段开始涉及中国现代化问题。其中,对中国问题论述的最早、最多也最有代表意义的是马克斯·韦伯。

韦伯对中国社会的研究几乎都集中在《儒教与道教》一书中。在这部著作里,他首先研究了构成中国传统社会的五种社会要素,即货币制度、城市与行会、世袭制、宗教组织与法律,并从中发现了一些有利于现代化的因素。然而,为什么有了这些有利因素,还不能发生现代化的社会变化呢?对此,韦伯试图从中国的宗教问题入手,揭示其间的奥秘。他继而对儒教、道教与中国社会的发展进行了研究。他认为中国之所以未发生现代化的社会变化,根本原因在于儒教所倡行的伦理中缺少一种为谋得来世的灵魂拯救而禁欲的清教主义。他认为儒教的伦理教喻对中国现代化发生着阻碍作用并归纳了以下几个方面:(1)儒教伦理的生活准则是无条件地肯定现世和适应现世,如“知足、安乐”,“知足者常乐”等等,这使人

们安于现状，而不能促使人们产生勤勉劳动的动机；（2）儒教中缺少自然法和名义法的伦理成份，缺少自然科学的思维方式及基础；（3）儒教伦理排斥经济性情和专家精神，阻碍近代合理体制的产生；（4）儒教伦理支配下的宗族共同体严重阻碍着合理经营体（近代企业）的产生，这也是现代化的一个严重障碍。总之，韦伯把中国未能产生现代化的原因归结为作为意识形态的儒教伦理。他说：“从纯粹的经济观点来看，一个中产工业资本主义未能在中国发展，基本上是因为缺乏一种特有的心理状态”。^①由于韦伯所处的时代还没有一个非基督教国家实现了如同英、法那样的现代化，这在客观上为韦伯的理论提供了宗教认识的前提。如果说把宗教伦理作为现代化的一个影响因素还具有某种意义的话，那么把决定现代化的因素仅仅归结于宗教伦理就很难令人信服了。

第三阶段的现代化理论研究中国现代化的特点是，将中国与日本相对比，并在其间的不同之处寻找中国未能实现现代化的原因。这一阶段代表性的理论，可推贝拉对中国社会价值体系的认识。

贝拉（Robert N·Bellah）把中国未能产生现代化的原因归之于中国的价值体系。他认为中国未能产生现代化主要是中国特有的价值体系作用的结果。

他认为，中日之间最基本的不同是“中国的特征是注重社会的整和，而日本的特色则是以政治或目标实现的价值为首要”，中国的整和价值关心的是体系的维持而非目标的实现，是团结而不是权力和财富。中国人对于社会体系维持的看法是希望“建立一套决定人际关系的社会规范，其目的只是为了社会体系的和谐平衡，并维持一种相互适应的状态。中国的礼教社会是一种经过调节的平衡状态”。^②贝拉认为传统的中国政体就是为了维持现存体系而不是为了积极的改革，不是为了实现发展目标，中国礼教社会缺少一种克服传统主义的动力。贝拉的研究重点是普通人民的日常生活，他的分析虽然有失偏颇，但他对传统中国的价值体系的分析，还是比较接近我国人民生活的真实情况的。

此外，列维的研究也具有代表性。列维（Marion J·Levy）试图从传统的中国家庭制度中寻找现代化的阻碍因素。列维认为，中国现代化的失败主要原因在于中国的家庭制度不利于社会的变化。他把中国和日本的家庭作了三方面的比较，找出了其间的差异。

第一个方面的差异在于家庭与社会的关系不同。他指出：“在日本，家庭的确占有很重要的位置，但它却是依附于其他社会因素之下的，社会乃产生不同的规范制约家庭，或使家庭为社会服务。而在中国，利用家庭为社会服务的可能性相当有限，因为中国的家庭结构远比日本要强”。^③他举例指出：在日本，人们以对封建国家的忠诚为首要，而对家庭的忠诚反是次要的，相反，在中国，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比家庭更显得重要。

第二方面的差异在于两个社会的阶级制度不同。列维认为，中国的阶级体系几乎是完全开放的，而日本的阶级体系则是完全封闭的。这两种相反形态对现代化发展的作用反应在两个社会中商人的地位上。他认为，中国商人的声望势力是十分低下的，开放的阶级系统允许商人的子女经过考试等正式途径或捐官、贿赂等非正式途径进入官僚阶层。在中国，向上的流动最理想也是最终的目的就是在政府官僚机构中谋得一席之地，财富只是进入官僚机构的

① 马克斯·韦伯：《中国宗教》，纽约1968年版，第100页。

② 贝拉：《德川宗教》，波士顿1970年版，第189页。

③ M·列维：《日本和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中的对比因素》；转引自S·kuznets主编：《经济增长：巴西、印度和日本》，DUC大学1955年版，第531页。

一种手段，经商是科举落第者的一个暂时职业。在日本的阶级体系中，任何由下往上的流动都被抑制，“一个人生下来就注定与其父母原有的社会地位相同。一个人在某一层次，其子女也理所当然的属于这个层次”（同前注）。日本的商人在如此封闭的阶级体系中，对于进入官僚阶层不抱任何希望，要想使家庭得到幸福，唯一的途径是兢兢业业地做买卖，而这正是日本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因。

第三方面的差异是日本强调长子继承，而中国则提倡平均继承。列维指出，长子继承可以使一代代的资本集中在一个家庭，这从两方面影响了现代化的发展。一是把资本有效地运用于大规模的工业投资上；二是鼓励有效力的商业行为。而中国的平均继承则使资本趋于分散，不利于现代化。

不难看出，列维所讲的中国家庭与社会的关系，实际上是指中国家庭在整个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在传统中国，家庭以及以家庭为基础的按亲缘组成的宗族团体，在整个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无疑是最基本的和最重要的，它是整个社会生活的中心。男耕女织，自给自足，民事纠纷也可以在宗族祠堂中解决，家庭和宗族构成了一个独立的社会生活单位，很少也很难同社会的其它部分发生直接联系。传统中国社会的结构是这些相互独立的社会生活单位的机械连结并在它的上面建立了一个封建王朝。中国社会结构的这一特点无疑是现代化发展的重大阻碍因素。在这一点上，列维的认识是有道理的。列维认为中国的阶级体系是开放的，并认为这是阻碍现代化的因素之一，而日本的封闭性阶级体系倒是现代化的促进因素，这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单凭一个科举制度就认为中国的阶级体系是完全开放的观点不免失之偏颇，而认为阶级之间的流动是现代化的阻碍因素这一点也是不合乎历史发展的逻辑的。社会流动向来被认为是现代化的条件之一。而存在于传统中国社会生活中的社会流动，之所以阻碍了中国现代化的发展，根本原因只能从这种流动的社会条件及实质内容中去寻找。列维只对这种社会流动做了形式上的考察和分析，这是不可能揭示其真实关系的。同样，他对中、日两国在财产继承上的差异的认识，也是流于形式的。因为，资本主义最初的发展，靠的是资本积聚和集中，而这又有赖于资本的原始积累；中国封建社会末期的资本之所以未能积聚和集中，主要原因是缺少一个资本的原始积累过程，而不在于财产的平均继承。

韦伯和贝拉在意识形态中寻找中国未能产生现代化的原因，列维则从中国特殊的家庭制度的影响来观察、探索，而摩尔（Barrington Moore）、艾森斯塔德（S·N·Eisenstadt）和佩伊（Lucian·w·Pye）则把中国现代化的失败归因于中国社会的政治制度。

摩尔在其《独裁与民主的社会起源》（Social origins of Dictatorship）一书中指出，中国社会的现代化未能成功的原因在于中国社会制度中的政治牵连（Political implication）。摩尔指出，中国社会的一大特点是任何事物都与政治相联系，受政治的影响。他认为，中国社会的政治牵连对现代化的阻碍作用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一些官僚体系中地位最低的、处在政府官员和普通人民之间的“官僚候选人”，不把主要精力集中在现代化上，而是为了争夺政治权力将精力浪费于一些无效的反抗和暴动上；而在日本，下层武士却是十九世纪中促进现代化的最大原动力；（2）封建集权时期的中国，从未出现过像西欧封建制度后期演变出来的中产阶级，因为中国人深信赚钱的活动对于学者、官员的威望是一种极大的威胁，政府谨慎地不使所谓赚钱的活动脱离政府的控制；（3）一方面，中国的贸易和工业的主要部分都是舶来的，政府不可能有任何国家工业化计划；另一方面，地方上的各种势力集团又企图利用现代化技术为实现他们自己的政治目标服务；（4）在十九世纪，中国的中产

阶级并不具有自己独立的意识形态；（5）采用企业化农业的失败表明，中国的地主阶级无意为供给城市而改进生产方法并增加生产。

摩尔第一点所指实际上是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官僚候选人”指的则是农民起义的领袖。农民起义的领袖并不是什么官僚候选人，更不是处在官僚体系中联系政府官员和普通人民的中层阶层；他们领导农民起义的起因也不是与封建官僚争夺政治权力，将他们与日本的下层武士相类比，是不恰当的。摩尔在第二点所指的“中产阶级”即是资产阶级，而在第四点所说的十九世纪的中产阶级，实际上就是民族资产阶级。在我国，明末清初就已有资本主义的萌芽，它之所以未能发展起来，原因很多，而统治阶级的限制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对中国社会的现代化无疑是具有促进作用的。但中国还几乎没有与民族资产阶级相适应的文化和教育事业，没有民族资产阶级独立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地位。就此摩尔的分析有一定的道理。摩尔所说的“企业化农业”指的是农业资本主义。诚然，几千年中国封建社会的基础是封建的土地所有制，虽然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我国曾出现过一些雇工劳动的农垦公司，但都最终归于失败而未能发展成资本主义农场。不过，“企业化农业”的失败并非如摩尔所说的那样，是由于中国的地主无意供给城市市场，而是由于中国的农产品市场控制在外国资本势力的手中，产品销路得不到保证而不得不改变生产方式的缘故。

艾森斯塔德在《帝国的政治体系》一书中认为中国之所以未能现代化主要是由于“传统中国社会里缺乏一种可导致广泛的和全面的变迁的情况”，支配中国变迁的形态一直是一种“适应性变迁”（*accomodable change*），也是一种局部的有限度的调整和修正。他认为，“中国是一个适应性变迁如何发生如何发展成形的典型社会。在中国，主要的变迁形态一直是适应性变迁和边际性的改革”。^①艾森斯塔德认为适应性变迁并没有干扰和破坏传统中国社会的和谐，不同政治和社会团体之间的冲突很快被原有的社会规范和制度所缓解。他认为在中国有三种可以用来向传统制度挑战的因素未能充分发展起来，即（1）政权分散的封建政治，由于士绅和贵族的阻碍而未能发展起来；（2）城市中的工商职业团体亦未能完全独立出来；（3）未能发展出具有普遍意义性质的宗教和价值取向。由于缺少这三种因素，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变得更加困难了。

艾森斯塔德对中国“适应性变迁”的论述仅仅停留在对现象的描述上，因为适应性变迁与未能现代化几乎是一同义反复。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描述这种适应性变迁，而在于揭示导致这种适应性变迁的内在原因，而这种原因只能从传统中国的社会制度及其文化背景中去寻找。

佩伊的论点主要是认为在近代中国社会的政治体系中存在着一种权威危机（*authority crisis*），这种权威危机阻碍着现代化的发展。他说：“中国的发展的一个最基本问题是其政治和社会制度中缺少一种权威，一方面满足其重新恢复自信心的需要，一方面又把社会按现代化的要求加以重新调整”。^②佩伊认为权威危机使得政治无法渗透到社会体系中去开发和组织资源以促进社会的发展，因而要想现代化是根本不可能的。佩伊的权威危机论描述的是鸦片战争以后摇摇欲坠的清朝政府和辛亥革命后的动乱现象，这种对特殊现象的认识，不免带有片面性。

^① 艾森斯塔德：《帝国的政治体系》，纽约1963年版，第323页。

^② 佩伊：《中国的政治精神》，麻省理工学院1968年版，第5页。

可以看出，上述西方社会学者的议论都是就某一个具体问题，侧重某一方面而发的，因而就其中某一个人的论述来看，都是不全面的和欠深刻的，有的仅仅是对现象的描述，有的则由于不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因而导致了错误的结论。但是，若将他们的观点综合起来予以认识，则可以使我们深刻认识中国社会现代化问题的复杂性，并确认综合考察整体社会的系统方法。

二

现代化理论在六十年代以前都只局限于西方社会学中，六十年代以后，由于日本的高速经济增长及蓬勃发展的现代化运动，现代化理论也随之由美国扩展到了日本，并形成了多学科研究。这样，现代化理论就由西方传入了东方。

日本社会学者在研究日本社会的现代化的同时，也对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行了深入的比较研究，其中最系统也是最具代表意义的当首推当代日本著名学者富永健一的研究。这里，主要介绍富永健一先生的“后发中国的现代化”理论。

按照现代化理论的阶段划分，富永健一的理论也属于第三阶段的现代化理论，但是，作为一个东方社会学者，富永健一的理论具有两个鲜明的特点。一是由于日本的文化背景比西方社会更加接近于中国，对中国的文化传统理解得比西方社会学者要准确一些，因而其议论也更加接近中国的实际情况；二是他不仅在某种意义上继承了西方社会学者的观点，而且在一定程度上综合并发展了他们的理论。

富永健一首先提出了“后发国家”的概念。他的所谓“后发国家”，指的是与西方先进国家相对应的非西方国家（包括亚洲、非洲及拉丁美洲，日本和中国均属后发国家），由于它们在现代化发展上比西方先进国家要晚，所以称为“后发国家”。富永认为，与先进国家相比，后发国家的现代化除了在时间上的后发之外，还有以下两个特点：

第一，不能自发地产生现代化。后发国家的现代化之所以是后发，根本原因在于它不能“自发”。富永总结了东方之所以不能产生现代化的四个方面的原因：（1）东方没有科学革命，没有自然科学，也没有社会科学，因为东方缺少科学革命的基础；（2）帝王专制统治很晚才得以克服；（3）不平等的克服也较晚，而现代化应由全体国民来承担，少数人占有财富和文化，不但不能导致现代化，而且还会引起阻碍作用；（4）缺乏实现现代化的国民主动性。

第二，在这些国家，现代化过程是内在发展和传播发展的统一。所谓内在发展指的是一个国家内部自身的发展因素；传播发展即输入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因素和西方文明以促进本国的现代化发展。富永认为，西方国家的现代化是通过内在发展而取得的，非西方后发国缺乏内在发展，或是内在发展不够充分，因而必须从西方先进国输入现代化的因素，即西方文明的传播，才有可能实现现代化。但是，如果没有一定的内在发展为基础，传播发展仍然无济于事。

后发国家的上述特性，决定了其现代化必须具备一些不同西方先进国家的独特条件，经过一个独特的发展过程。富永健一把这些独特的条件和独特过程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①

（1）推翻专制统治，与传统主义相决裂。非西方后发国家现代化的第一步是克服现代

^① 富永健一：《现代化理论之今日课题》，[日]《思想》杂志，1985年4月号，第120—122页。

化的最大障碍——封建传统及其专制统治，这是一个由对本国传统社会的危机意识而产生的对传统社会的破坏过程。

(2) 由推行现代化的精英人物，身居中央政府，强行输入西方文明，并使之固定下来。非西方后发国家现代化的第二个步骤是在破坏传统社会的同时，有计划、有意图地输入西方文明，因为它们不能“自发”。但是，从西方输入现代化文明，在国内必然遭遇一股强大的、旨在维护传统社会的传统主义力量，因此必须有一批推行现代化的精英人物力排这种力量，从中央“自上而下”地推进现代化的发展。

(3) 输入西方文明，在这些国家内部的承担者，应在民间大量涌现。非西方后发国家现代化的第三个条件是在一般民众当中涌现出大量的企业家、专家、专业技术人员和熟练工人、半熟练工人等等现代化的承担者，学习和运用西方先进的文化、科学技术，使西方文明深深地扎根于本国土壤，由外来文明变成自身的文明。精英人物和中央政府只是为现代化开辟道路和创造条件，而现代化运动的真正承担者则是广大的人民群众，如果没有人民群众的响应和支持，没有人民群众兴办实业，现代化运动只能是半途而废。

(4) 解决现代化部门与传统部门的对立和斗争，解消二重结构。这是非西方后发国家现代化的最重要条件，也是最艰巨的任务。现代部门与传统部门这一二重结构的对立和斗争，就是现代派与传统派（人的因素）、现代工业与传统农业手工业（产业因素）、都市与农村（地域因素）等方面的对立和斗争，这是后发国家现代化过程中的必然现象。结果应是现代派、现代工业和都市等现代部门的逐步扩大，传统派、传统农业、传统手工业和农村等传统部门的逐步缩小并最终趋于消失。这种二重结构一旦消除，后发国家的现代化就进入了一个持续而稳定的阶段。

富永健一认为，日本和中国均属后发国家，不同的是日本已经成功地实现了现代化，而中国则正处在现代化的始发阶段。他认为，自从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中国现代化的第一个条件便满足了，实际上它标志着中国现代化的开始。自1911年至今，中国已经具有七十多年的现代化历史。但是，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封建专制统治，但对中国的现代化并未产生实质性的影响，这是为什么呢？他认为，这是由于中国在满足人民生活必要需求上，向来是家庭、亲属的作用很大，国家的作用很小；由于无需靠国家权力的帮助就可确保经济自足，人们对家庭的忠诚就远远超过了对国家的忠诚。“这种情况下，政治革命对人民的行为方式和意识形态的变革就很难凑效了，因而在近代革命以后，中国人民还是一如既往地生活在传统的家庭、亲属和村落结构中。”^①在这一点上，富永的观点与列维是一致的。他把辛亥革命与日本的明治维新作了比较。他说，日本的明治维新虽然推翻了德川幕府，但还保留了天皇制度，从这一点来说，日本的明治维新不如中国的辛亥革命彻底。但是，由于日本的家庭和亲属制度不同于中国，明治维新对日本人民的日常生活产生了巨大影响，极大地促进了日本的现代化发展。中日两国现代化之差别从这里就已经开始，辛亥革命的失败已经决定了中国社会的现代化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甚至是艰难曲折的。

明治维新以后，主持日本明治政府的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山县有朋和井上馨等人在中央政府实行一系列产业化和西方化政策，推进了日本的现代化发展，从而使日本满足了后发国家现代化的第二个条件。但是，辛亥革命后的中国却是军阀割据和激烈的内部混战，袁

^① 富永健一：《中国社会之现代化》，[日]永井阳之助编《二十世纪的遗产》，文艺春秋社1985年版，第252页。

世凯和段祺瑞等军阀头子身居中央之要职，却没有半点现代化的意识，使得中国一直不能达到现代化发展的第二个条件。一个现代化运动的强有力的政府始终未曾在中国出现，这是产生中日两国现代化发展之差别的又一重要因素。

富永对后发国家的现代化精英人物特别是中国的孙中山提出了一些看法。他认为，孙中山几乎是当时唯一的具有现代化思想的领导者，但他始终只是一个软弱的革命运动家，未能成为一个促进中国社会内部现代化之稳定趋势的领导者。孙中山具有强烈的社会主义倾向，他的民生主义实际就是社会主义，这妨碍了孙中山推行资本主义的现代化政策。他说，这也许是一些后发国家的领导人看到西方先进国家的种种弊端从而不想重蹈覆辙的缘故。他认为，非西方后发国家的新式知识分子和政治家，容易产生一种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次革命”一次进行的思想，他们很难成为革命后现代化建设的好领导。

富永继而分析了中日两国在后发国家现代化过程第三个条件方面的差异，他认为，日本的现代化能够在短期内成功，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具有决定意义的是从旧武士、农民、市民等各阶层中涌现出许许多多的实业承担者，使得从外部输入的西方文明和西方先进技术能够在较短的时期内，充分地消化变成自己的东西。但在中国，却没有出现输入西方文明的民间承担力量，如果考虑到农业人口仍占近百分之八十，只能说仅仅停留在现代化的最初水平上。

二重结构的解消是后发国家现代化的关键。现代部门与传统部门的对立最终都集中在现代派与传统派的斗争上。现代派是西方倾向派，传统派则是国粹倾向派或反西方主义派。西方文明在进入日本之初，曾被当作“外夷”而加以排斥。从幕府末期的攘夷论，经过明治初年的神风连之乱和秋月之乱等一系列土族叛乱的反西方主义，到明治和法西斯时期的反英美主义，现代部门与传统部门的对立和斗争始终异常激烈，并最终导致了日本的全面战争。战争的失败给日本带来了福音，彻底摧毁了原来日本无力自行摧毁的传统派势力，二重结构得以解消，日本开始了快速、持续而稳定的现代化发展，到七十年代中期，终于成功地实现了现代化。“日本这种始于幕末维新的无力自行解决的二重结构，出乎意料的由战争的失败彻底解决，这对于日本来说，真是一个侥幸的历史偶然。”^①

富永健一指出，与日本一样，中国也有中华天朝的思想，由于鸦片战争，中国对西方的抵触情绪更甚于日本。义和团运动是西方产业文明进入中国之初的一场反西方主义和反现代主义运动，其规模是日本的神风连之乱和秋月之乱所无可比拟的。富永认为，在中国，现代派与传统派的对立和斗争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仍在继续，人民公社、大跃进和大炼钢铁运动都是与现代化背道而驰的，“文化大革命”是现代派与传统派最激烈的斗争。十年间，中国的现代化完全停滞了。这种对立和斗争是非西方后发国家的现代化过程中所不可避免的，在中国，这种对立和斗争以最极端的形式表现了出来。

三

综观各阶段及各种代表性的现代化理论，都持下列两个观点，一是认为非西方发展中国家之所以未能现代化，完全在于其国家内部的社会制度和传统文化不适于现代化发展；二是鼓吹“西方中心论”，认为非西方发展中国家只有输入西方文明，在技术、经济、政治、文化

^① 富永健一：《现代化理论之今日课题》，〔日〕《思想》杂志1985年4月号，第122页。

等各个方面都“西方化”才能实现现代化，对于非西方发展中国家来说，现代化就意味着西方化。现代化理论的这两个观点也许正是导致五十年代发展理论兴起之后，现代化理论与发展理论相重合而成为发展理论的一个分支的原因所在，因为发展理论具有与其相同的观点。

上述两个观点存在三方面的缺陷：

1. 鼓吹上层建筑决定论，如韦伯的宗教伦理决定论，贝拉的价值体系决定论；
2. 把中国社会未能实现现代化的原因完全归结于中国社会之内部因素；
3. 认为中国社会若要现代化，必须引进西方文明，进行西方化，这一点在富永健一的理论中得到了最集中的体现，艾森斯塔德所说的三种用来向传统制度挑战的因素也是按照西方模式设想的。

上层建筑决定论是完全违背唯物主义原理的，这一点我们已无须赘言，而对于第二点和第三点，却必须添一笔墨。

的确，一个国家能否实现现代化，其内部之社会经济制度和传统文化无疑是非常重要的因素，但是，这决不是唯一重要的因素，因为外在的因素也会对现代化产生相当大的影响，有时还会发生决定性的影响。例如，有无殖民地史对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发展毋庸讳言会有巨大影响作用。这是因为：（1）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目的就是为了把受侵国变为它的殖民地，而并非为了催发其资本主义的发展，在殖民地时期是不可能现代化的；（2）当该殖民地国家摆脱了资本主义的殖民统治，取得了政治上的独立之后，业已形成了殖民性的经济格局和文化模式，虽然在政治上已经独立，但在经济、政治和其他社会生活上仍依附于宗主国家，现代化仍难以产生。殖民地国家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难以摆脱殖民地的影响，这已经成为严重障碍这些国家现代化发展的事实。中国社会也是如此。几千年的封建传统确是中国社会现代化的重大阻碍，但是，众所周知，从明末清初开始，中国社会内部已经出现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中国也会缓慢发展到资本主义，并实现现代化。外资的入侵，完全改变了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使中国变成了一个半封建和半殖民地的社会。而半封建半殖民地成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沉重包袱，这个包袱一日不去，中国便一日不得发展。为了卸掉这个包袱，中国共产党花了五十多年的时间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付出了血的代价。可见，有无殖民地史对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发展确实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日本已经实现了现代化，人们（包括上述诸社会学者）为其罗列了不少的原因，但都忽视了一个根本性的原因，即日本没有殖民地化，这是由西方资本主义合力侵略中国，无暇顾及日本而由中国代受其苦的缘故。从这一点来说，中国近代之未能现代化就是日本之现代化的代价。

现代化理论认为只有西方化才能现代化，这完全忽视了现代化发展的多样性原则，历史唯物论认为，社会发展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同样这一原理也适用于现代化发展理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实现了现代化，非西方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也可以从西方引进一些现代化的科学技术和管理方法，但并非一定要西方化。西方有西方的现代化，东方有东方的现代化，资本主义有资本主义的现代化，社会主义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这已为非西方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实践所证明。我们走的是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因而不可能完全照搬西方模式，也不可能全盘西方化。

作者工作单位：天津南开大学社会学系

责任编辑：张宛丽